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典藏本

杨炳章 著

Benjamin Ya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 伟 译



013068256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D231
23(T)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典藏本

杨炳章 著
Benjamin Yang
郭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D231
23(T)



北航

C16757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杨炳章著；郭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ISBN 978-7-300-17637-6

I. ①从… II. ①杨… ②郭…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一人物研究 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 IV. ①A755 ②K26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946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典藏本

杨炳章 著

郭伟 译

Cong Geming dao Zhengz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1 000

定 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 问 冷 溶 逢先知 龚育之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忠杰 李君如 章百家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牛大勇	冯筱才	朱学勤	任剑涛
许纪霖	杜 蒲	李向前	杨奎松	宋新宁
沈志华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韩 钢	景跃进	程 农	

出版说明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颇富个性的诗人。鉴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鉴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数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之“现代性”和比较政治学的宏观视角上，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毛泽东研究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这套“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首先旨在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同时也期望为人们进一步审视和反思 20 世纪人类的“现代性”过程，提供一个侧面的资料支持。

2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心合作的科研出版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诸位专家，为本译丛的持续和拓展做出了大量建设性的贡献。秉承学术研究的基础准则，我们注意精选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影响，持论公允、论说严谨的研究著述。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论证的学术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也在选择范围之内。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作者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专家，他们慷慨允诺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是促成此一国际学术交流盛事的基础要素。国内各位权威专家慨然允诺担任译丛的顾问，是对我们译介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审读专家们对选题和译文所提出的多方面的修改意见，也是译丛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译丛翻译出版的专家、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敬意和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均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核校；凡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以及特定条件的局限所带来的问题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编委会

2013年8月

中文版序

本书原英文版已有序言，这里只简单地针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十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能再次出版，我自然很高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希望一般读者翻阅后觉得有意思，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读者觉得有收益。

这本书名为《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写过一本《中共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曾热心帮助，而今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过世了。

该书扉页上写有：“敬献给我的父亲，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老共产党人。”其中具有某种严肃的理想主义意味，我不是为了靠它赚钱，也不是为了靠它求职。

既然书是献给父亲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码我自己心里这样要求。其内容是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题材讨论毛泽东路线和权威的确立，以及中国政治和中共革命的关系。我脑子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内最高水平，一个是国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阅该书，对有些具体观点可能有质疑，我仍然觉得总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可以留得下的。现在已有该书中文版，且看读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国外“汉学家”、“中国通”的争议不用说了——他们往往是粗枝大叶，隔靴搔痒——我更注意的还是同国内学者的商榷。随便

举一个例子，比如以往广泛称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实认识。第一次主要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的，或者两项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我认为沿着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关历史文献，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中央红军和其他红军，不免陷入一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者”的立场和作用，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上的用心和对于西路军的分心，在抗日战争中处理敌我友之间的方针策略，进而中共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总体联系，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予以认识——这种方式也许超出了我们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不过归根结底，总是一个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写一本书《毛泽东的武功与文采》，一次一次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胜就是胜，败就是败；一篇一篇分析毛泽东的书文和诗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也许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政治上固然应该守边，但这种研究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采用的。

本书有没有重大错误？有！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显然是低估了。对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变化趋势，我的判断显然也是不对的。

当时中苏两国都在谈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我曾觉得苏联行，中国不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了。我必须承认，我也乐于承认：我错了，苏联不行，中国行。记得1986年在北京大学见到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先生，他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欣赏，

6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对苏联形势表示乐观。

看来我犯错误，还是无独有偶呢！我相信赵老师同我一样，也乐于承认这一错误的。国家好就好，个人对错何妨？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这需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感谢我的同事萧延中教授和郭伟女士。

杨炳章

2005年12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鸣谢

我个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被囚禁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在那里，被囚禁者只准阅读毛泽东的书，不准读其他任何读物，甚至连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官方的《人民日报》也不允许看。为了在两餐之间“杀时间”，我反复咀嚼《毛泽东选集》（四卷）不下五六遍。不言而喻，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政治。

1973—1974年，在山东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期间，我曾费心写过一本大部头的书，取名为《政治与中国政治》。这本书主要是批评当时那种野马无羁的激进的革命路线，其中专门一章是写中共党史的。我把厚厚的十章手稿通过邮局寄给了毛主席，还附了一封长信。当然，我没有得到什么答复。现在我有时还猜想，这部书稿说不定还保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某个地方呢！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罗斯·特里尔把我介绍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当时正准备去中国重走当年的长征路。与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相识最终促使我打算研究长征这一课题，虽然在研究方法上与索尔兹伯里有不同之处。在我最近回国探亲期间，我走访了一些学者、官员、老师、学生和朋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中共党员。我要感谢他们，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已故的胡华教授。他们不仅为我所研究的具体历史问题提供了帮助，最重要的还是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总

2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体印象：共产党人的确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而这场变革同本书所要详细阐明的中心论题大体是一致的。

我多年来得到哈佛大学本杰明·I·史华慈教授的亲切关怀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精心指导。只在此说一句“谢谢”，是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二人深厚的感激之情的。我想，他们对我一个外国学生的全部希望无非是我本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这里我倒想许下诺言：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使他们在和将来都不会失望。

费正清先生的著述是我查阅此前西方出版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的便利向导。山田正雄教授的作品以及他和我个人之间的私人交往使我注意到许多有关的日文文书。在写作和修改本书的过程中，我曾把部分手稿提交给帕克斯·科布尔、凯瑟琳·哈特福德、米歇尔·奥森伯格、安东尼·塞奇、约翰·史莱克和弗雷德里克·威克曼等人审阅，并从他（她）们那里得到了热情的鼓励或中肯的建议。尽管如此，我个人的疏忽和固执使我不能不对书中可能存在的瑕疵负全部责任。

对下面各章和注释中所提到的所有作者我都要深表感谢，他们提供的见解和信息使我很受启发，尽管我所表达的有些意见也许与他们不尽相同。我充分认识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政治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因而不想看到自己去随便挑剔别人。如果我在这一学术研究中偶然犯下这种罪过，那么我只能引用孔夫子的话为自己聊作申诉：“当仁不让。”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在人性原则上是不能妥协的。我抱着同样的态度，也期待读者能对本书提出任何合理的批评。

杨炳章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敬献给我的父亲，
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
老共产党人。

目 录

作者鸣谢	1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二章 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14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44
第四章 第五次围剿与长征	72
第五章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102
第六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31
第七章 落脚陕北	161
第八章 红军大会师	191
第九章 毛泽东作为政治企业家的才略	220
第十章 结束语：从革命到政治的长征	251
附录一 长征大事记	268
附录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 萧军	278
参考文献	289
注释	297
索引	345
译后记	372

第一章

引言

真不知道曾经有多少著名学者和杰出政客试图对当今世界本质或时代特征下过定义！他们给当代世界贴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标签，诸如什么“精神危机时代”，什么“社会重建时代”，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什么“天下大乱时代”，如此等等。我个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基本特征仍然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对抗，尽管这两个词似乎已经显得有些陈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界，几乎一切重大问题无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此种对抗有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两个方面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一个占地球面积十五分之一和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而拥有的党员人数占全世界共产党员的一半以上。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她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她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论战并毅然决然与之分道扬镳；现在，她又在倡导实施“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这种令世人瞩目的务实政策。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进行革新的代表和象征。

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是最合适的方法之一，而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即长征时期则显得更加有趣。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

* 当我 1986 年初为本书写此注释的时候，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刚刚被赶下台，阿基诺夫人正面临着如何解决美国空军基地和共产党游击队的问题；韩国各反对党正在发动反对全斗焕军事政权的抗议活动，全则利用来自共产党的朝鲜方面的威胁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里根总统正在使其针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所采取的反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行动逐步升级，而美国政府对是否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正犹豫不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正在一本正经地实施公开性政策，并且呼吁削减乃至销毁核武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一连串的事件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是何关系，我们可以一目了然。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能力足以摧毁全地球，毁灭全人类；相反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把现有生产能力和人物资源全部用于发展经济建设的和平事业，那么，不妨借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将在五年之内翻上一番。从这种物质意义上来看，我们的确正进入一个绝无前例的人类历史时代。

化：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艰难跋涉两万余里，从华南转战到了华北；共产党本身的地位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关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常常把它称作中共历史的转折点。即使在五十多年后，长征的幸存者仍然驾驭着中国政治的航船（对此，我曾专门查证并撰文分析过）^[1]，甚至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把他们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称之为“新长征”。正如同长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经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的象征。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虽然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曾引起过不少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景仰和赞美（其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所提供的信息是最新的，而且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也是最为可靠的），但是在西方，严肃认真研究长征的学术著作仍不多见。而中国方面的问题在于，局限于具体人事的论述而缺乏一般性理论分析。^[2]

定 义

1934年末至1935年初，还在行军途中时，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尚未被命名为长征。当时共产党人称之为“西征”，因为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正在向西部的省份进军。^[3]在敌对的国民党军队看来，红军的西进只配称之为“西窜”而已。^[4]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二万里长征”一词最早出现在蒋介石一次讲话当中，用来指他的国军对共产党人的追剿。薛岳是国民党的一员骁将，他曾率领国民党第二路军追击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从江西沿路追击，一直把中央红军追赶到四川。据薛岳讲，当他完成追剿任务后，蒋介石曾发表讲话予以赞扬。蒋说：“通观古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进行过这样一个行军两万多里的长征。今天，我们创下了这个纪录，而创造这个纪录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第二

路军的将士们。”就共产党方面来说，只是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结束其长征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才开始使用长征一词。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5]这些话不仅标志着共产党人开始使用长征一词，而且显然也表明毛泽东把他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看成是长征的结束，尽管当他在1935年底讲这番话时，另外两大主力红军还在为完成他们各自的长征而辛苦挣扎。

要么是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要么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长征不久便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有关人员的一种名誉和资历的象征——后来在官方的表述中，长征的持续时间延长到1936年10月，以便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历程也包括进去。而长征的起始时间则仍然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的日期。因此，在正式的中央出版物中，长征的期限现在被确定为从1934年10月始，到1936年10月止。^[6]

然而，这里便有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如果说长征不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且也指其他红军部队的长征，那么红军的长征就不止一个，而是有几个，而长征的起始时间——若把长征看成一个综合历史时期的话——也就必须由此加以更正才对。事实上，早在1932年秋季，由于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就已撤离各自的根据地，开始远征行动。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指明的，这个时间应作为长征真正开始的时间。^[7]

关于长征结束的时间也应该有所争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部队在甘肃东部会师，但这未必就意味着长征的结束，因为与此同时，还有2万人的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二，占全部红军的将近一半——正在跨越黄河，“西征”新疆。历尽千辛